

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

徐 畅 牛淑萍

于斌是中国天主教著名领袖，他不仅在天主教教会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政坛也十分活跃。本文通过述析于斌在抗战时期言行，展示其多彩人生的一个侧面。

一 于斌主教生平略历

于斌（1901—1978年），号野声，黑龙江省兰溪县人。6岁丧父，7岁丧母，幼年极为孤苦，靠祖父祖母抚养成人。1915年随祖父祖母迁居海伦县，受洗信奉天主教。1916年毕业于黑龙江省立师范学校，1918年入吉林省修道院。1919年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成为全省学运代表。1922年毕业于震旦大学法科，次年入吉林大修道院研究哲学。1924年留学罗马传信大学，3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又获神学博士学位，旋任教于传信大学。1933年获意大利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领受意大利国王所颁勋章及爵士衔。同年，教皇简任于斌任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11月于斌由罗马返国，12月于北平就职，兼任教皇驻华代表公署秘书、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委员、北平辅仁大学董事，1934年兼任中华全国公教学校视察主任，1936年出任南京教区主教。抗战爆发后，于斌先后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劳军团团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于斌曾任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去台湾后，曾任益世电台董事长、辅仁大学校长等职。1969年教皇授其为“枢机主教”，即红衣大主教，1978年病逝于罗马^①。

二 日本侵华的实质

近代以来，日本从来就没有停止侵华的步伐，但它却以种种借口和美名，为其强盗行径辩护，欺骗世界舆论，于斌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日本说它之所以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秩序混乱”，于斌则指出“其实他们就是制造混乱者”，他说：“现阶段的战争是不义的侵略”，“战争是日本军阀引起的”^②，其目的是“窃吾人之物产地，倾流吾国人之血，剥削吾同胞之自由”。于斌质问道：“日本侵略者在九国公约中曾允诺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日本当作何解释？”又质问道1928年日本也参加了“巴黎非战公约”，该公约规定“设有争端，不论如何性质，因何发端，只可用和平方法解决之”，而“彼今日要求任何国家，甚至其共同缔约之国家，不得丝毫过问其所加害于中国领土之野蛮残暴”，日本当局又当作何解释？日本侵华是“想从人类中间，筑起一道日本壁垒来，穿过中国，并把中国层层围绕，这样好使我们与人类隔绝”^③，从而任其宰割。然而日本何以如此大胆？原因就在于它“并非循国际和平之路，只利用最新式发明之技术便利，陷于一种过渡之帝国主义观念”，“在此世界中，彼唯一感兴趣之物，即彼之自身，拆穿日本帝国主义而展现在吾人面前者，即其坚决之集体自私心理”，日

本正是利用这种心理，“欣欣然轰炸吾和平人民，轰炸吾老弱病残妇孺”，并且“阻挠吾人之努力，挫折吾人之善念，干涉吾人之工作，屠杀吾人之同胞，轻蔑吾人之尊严，践踏吾民族之生存”。日本在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的同时，又“佯言拯救吾人，出诸口者，尽系甘言”，实则大耍两面派手腕，“巧妙订立法理之形式，口头上作互助、正义、慈善及维护和平之宣言”，“遑遑然以援助被难者为己任，然背后暗影中，乃见其冷酷与残忍之狰狞面目”，“凡此种种，皆出于有计划之暴力，为最温和之笑脸”^④。与这样的国家打交道，何来道理可言？于斌指出“民族的幸福只能建筑在正义、荣誉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⑤，现今既然日本不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也就只有通过正义的战争对付日本的侵略，去争取两国真正的和平了。

三 天主教的正义与行动

于斌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其爱国思想，既来源于他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民族情感，来源于家乡被日本占领和蹂躏的痛楚，还来源于天主教的爱国观、正义观与和平观。于斌说：“天诫十条的第四条，要人孝敬父母。所谓父母，不只生身父母，凡代表天主统治国家的政务者，都包括在内，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去寻找理证，许多句可作为我这句话的注脚。保禄宗徒说‘你们要服从一切主权，因为没有一样主权不是来自天主’。自然，所谓主权，是合法的，正当的主权，这其中就包含着爱国的真义”^⑥。于斌曾在不同场合与时间，多次阐述天主教的爱国观，以激发教徒的爱国心。还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于斌在《公教人与爱国精神》一文中指出“爱国理论，绝不出公教做人的原则，教友的生活越向上，爱国精神也就越圆满；反之，不管国家存亡的人也必不是典型的信友”^⑦，所以他敢“大胆的说一句，爱教不爱国不能拯救其灵魂”^⑧。卢沟桥事变不久，于斌即对南京教徒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丧失了与其他民族共存共荣的诚意，往往迷信武力，强凌弱，众暴寡，为目的不择手段，于天主教博爱人类共济的福音大相径庭。”^⑨

针对“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思想在天主教教徒中有一定的市场^⑩，于斌指出天主教教徒仅有爱国心和正义感，还是远远不够的。他援引耶稣的经历，向教徒说明天主教爱国的真义。他说耶稣“自动地进了耶路撒冷城，自动地在圣殿里讲道，为真理而辩护，他心甘情愿而死”，所以“耶稣是先行而后言的，这也是公教的传统，不许任何人任意更改的”，他又说“贡献的表示的业绩，决不是空口而能幸致的，必须有切实的工作而后可”^⑪。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屠杀无辜平民，天主教教徒应该奋起抵抗，因为圣多玛斯说“为正义而战的，正是寻求和平者”，“这样作战，他们反对的和平，决不是吾主降世所带来的和平者”^⑫。天主教的爱国观，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行的。“公教既命教友救国爱国，所以也决不是教我们只喊几句口号，就算尽了爱国能事；反之，必须本着公教的超性精神牺牲主义，把爱国的理论一一付诸实行”^⑬，为此，天主教教徒应该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爱国观和正义感。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于斌就高呼：“势急矣！势迫矣！”号召南京教区的教友将学校及宿舍的一部分让出来，作收容伤残军人和难民之用。并要求教徒紧急购买药物、纱布和绷带，还要求有知识的教徒向民众演说，宣传防空防毒的战时常识。武汉会战时，于斌就天主教教徒如何救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 从军。他说“执干戈而卫社稷，原是国民应尽的职责，现当我国实行征兵制，又在全国动员时期，凡已界应征年龄的男子，不得逃役，不得隐瞒，否则，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良心，不是一个好国民，更算不上一个好教友”，鼓励天主教教徒当

仁不让，冲锋陷阵，为国牺牲。2. 生产与节约。抗战爆发后国家经济十分困难，为此，凡是没有走上前线的天主教教徒，应该努力生产，贡献国家。同时还应厉行节约，“把节省出来的零碎钱，积少成多，拿出来贡献国家，你在抗战救国，救护灾黎，不知能添上多少力量”。3. 救护。于斌以多俾亚埋葬了死亡的人而得到天主格外降福为例，号召天主教教徒“组织大量担架队，将阵亡的将士，设法埋葬；受伤的，想法送到后方医院医治”^①。由于日军的战火造成了大量的难民，天主教会于1938年在武汉成立了全国救护总会，各教区均设立分会，教徒应积极为之服务。4. 宣传。天主教教徒应该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5. 祈祷。为中华民国祈祷，为伤亡的将士祈祷，祈祷正义早日实现，和平早日降临。此外，于斌还告诫教徒：“一切伪组织和傀儡，是敌人制造出来破坏我们政权的统一，毁坏我国领土完整的东西”^②，天主教教徒绝不能去干出卖祖宗，背叛国家的汉奸勾当。

抗战期间于斌还不断地援引基督教徒保家卫国事迹，自励励人。1937年于斌衔命出访欧洲，路过比利时，前往玛琳城教堂朝圣，拜谒在祖国遭受侵袭时大声疾呼救国的迈尔谢枢机主教墓，盛赞其“融合宗教与爱国心而一之”，表示“将步迈尔谢之后尘，谨遵其遗教”，“大声疾呼‘天主教正义’”。武汉会战期间于斌援引明末天主教徒瞿式耜誓死报国，焦琏、庞天寿等人，虽以刑余之身，“当着明朝危亡时，而能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以此激励天主教教徒效法其精神，英勇报国。抗战爆发后，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相当一批人的心头。于斌从天主教教义阐发了中国必胜的信念。他说：“中国之无限信心，寄托于天主之正义及天主对吾人之宠爱，因此我国被难或死亡之人，彼等之牺牲，非徒然也。”^③面对抗战初期中国步步退却，军事屡屡失利，于斌指出：“反背正义者不会胜利到底，并且，在敌人这次甘冒不韪，涂炭无辜的侵略战争中，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们，这在天主眼前，是极端明白而合理的。”他号召天主教教徒为胜利、为和平而祈祷，并坚信正义必然胜利。“我们毫丝不必畏惧，天主即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祈祷，它直达于天主台前，使天国与正义实现于人间，使我们获得附带而来的一切幸福”^④。武汉失守后，于斌在昆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他“不相信菌类的暴力能压倒人类，摧毁正义”，“绝对相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极端否认悲观论与灭亡论”^⑤。虽然天主最终必然会伸张正义，但天主“有记性，没急性”，“胜利的快慢，成功的早迟，就要看人心的热度的高低了”^⑥，所以全国人民包括天主教教徒应该为抗战多出力，争取抗战早一天胜利。

四 奔走于教内教外

抗战时期，于斌除大力宣呼天主教教徒爱国，号召其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外，他自己更是以一个天主教教徒身份，奔走于教内教外，在办报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慰劳抗日将士和国民外交（下节再述）诸方面，身先士卒，为天主教教徒树立了榜样。

1937年8月平津沦陷后，天津所有爱国抗日的报纸均被停刊，只有华籍比利时人雷鸣远神父于1915年在天津创办的《益世报》继续发行，刊登揭露日本侵华文章，尤其是刊登了10月28日于斌在国民外交协会的一篇演说，轰动一时，因而触怒日军，被迫停刊。1938年12月《益世报》在昆明复刊，复刊词声称其宗旨之一就是“对日寇的侵略行为，谨守一贯主张，坚持抗战到底”^⑦。抗战时期，该报刊登了大量新闻、时评文章。如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

公开投降,《益世报》立即口诛笔伐,痛加斥责。战时《益世报》在宣扬国策,激励抗战精神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救护伤亡士兵和救济难民在战时是一项重要工作。“七七事变”后不久,于斌受国民政府委托,在浙江兰溪成立第十一后方医院,后又在汉口组织中华天主教救护总会,收容救治伤兵。抗战期间,于斌多次到前线劳军,鼓舞士气。1941年受蒋介石指派,于斌以全国各界劳军团团长身份,三次前往长沙、衡阳一带前线劳军。此后又曾慰劳桂林、柳州、西康等地抗日将士。1943年鄂西大捷,于斌等前往恩施慰问。1945年历时33天,冒险远赴缅甸劳军。为救济孤苦难童,于斌1941年9月在重庆创设难童职业学校,附设工艺工厂,自任董事长,收容难童^{②1}。为护养烈士遗族,抗战胜利后,于斌还在苏州成立了遗族学校,收容孤儿达1千余人^{②2},从而获得“孤儿之父”的美称。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荒,哀鸿遍野,于斌领导的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也发动了大规模赈灾工作。

为尽一个参政员的职责,于斌对社会时弊并未忘怀,而是随时指陈。于斌在昆明的一次演讲中,就抗战期间“有钱有力者大多逃避责任”现象提出批评。他以“献金运动”为例,“照理想上说,这种有重大意义的救国运动,有钱有力的富室豪商缙绅耆宿,必定是‘闻风而兴’,站在民众的前面,并以身作责”,“岂知事实上并不如此,真正出钱出力的,除去劳苦工人,贩夫走卒,贡献其辛劳血汗换来的工价或其力量外,大多都是中产阶级,或纯靠脑筋心血支持生活的知识分子”,而“拥有巨资,席丰履厚”的富家翁、大腹贾,竟“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为此,于斌号召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一个个‘力’,团结成一个最大的‘力’”^{②3}。只有依靠这个“心”,这个“力”,中国才能打败日寇,完成国家独立、解放的使命。1943年冯玉祥(基督教)、白崇禧(伊斯兰教)、太虚(佛教)和于斌(天主教)等7人发起成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于斌担任轮值主席。联谊会成立后,举行不定期演讲,号召宗教徒联合起来,谨防日本欺骗利用,以实际行动保卫祖国;同时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一方面派宗教领袖出国访问,一方面邀请国际知名人士来华访问,扩大反法西斯联盟^{②4}。

五 开展国民外交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与欧美各国既通过官方打交道,又通过民间人士互通信息,抗战时期于斌的外交活动正是国民外交的一个典型事例。于斌精通十数种欧美语言,与西方社会上层人士交往颇多,在国内又深受蒋介石的器重和赏识,加上他可以一个天主教教徒的身份出访,在日本与西方国家关系尚处于十分微妙的时期,更易为欧美各界人士所接受,所以于斌堪称国民外交的合适人选,而他也没有辜负其种种便利,利用其特殊身份在抗战期间先后8次访问欧美,足迹遍及欧美数国,对国民政府外交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广泛地做了许多工作。

首先,揭露日本侵华真面目和欺骗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同时,还向国际社会施放烟幕弹,迷惑世界舆论。于斌所到之处,无不尽力宣讲日本侵华真相。他指出“日本对一切教会事业,满不在乎地破坏教堂、医院、学校,甚至外籍传教士也常在不幸的敌人炮火轰炸下牺牲”。日本轰炸中国不设防城市,反而说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与繁荣,为了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于斌质问道:“当诸君见及吾人不应受之灾难,吾人之痛苦,吾人之死亡,尚不能为吾人流一滴同情之泪乎”^{②5}?于斌还告诫欧美诸国,中国是在为世界和平与自由而战,因

为目前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问题。因为“当日本力量充足时，即将派遣征讨大军至贵国，诸君一如往昔，信其诚恳及无私之甘言，直至一日清晨从梦中惊醒，但见满城大火，有如天降，诸君即不成灰烬，必见死伤载道。彼时诸君即为贵友及世界错误纠正者之牺牲品矣”！所以“此问题自今日始，已成为世界问题，为诸君自身计，此时乃全人类应醒悟之时期矣”。于斌此一段话分析透彻，不仅发人深省，而且深具预见力，珍珠港事件不就见证了这段话吗？日本在国际社会上的宣传一定程度上使各国民众观念混乱，利害判断不清。对此，于斌“在旅程各个阶段中，尽一个中国主教之责，为真理作证，对一切有能力而又愿意赞助中国之正义人士，在彼心目中存在任何之误解，足以隐蔽真理者，将一扫而空之”²⁶。日本对国际社会的宣传，“不外三种，（一）、中国将赤化；（二）、中国抗战必败；（三）、中国人无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能力”²⁷。针对以上三点，在1937年的出访中，于斌用“招待新闻记者；个人或团体访问；公开演讲和作文印书四种方式”，进行解释和批驳。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于斌说“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中国已经破产了”，“即彼等急欲救国而思借助外来恶力（指苏联——引者注）之人亦得骤然就范矣”。他还说：“中国的反共运动是自动的”，“它不经外国势力援助，就发动了这场运动”。这里于斌不仅希望借此解释消除欧美国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同时也暗示日本以消灭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为借口，侵略中国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根据的。关于中国抗战前途，于斌从经济、军事战略、民心士气、国家政治诸方面，论证中国抗战必胜。他说南京失守并不是战争的终点，因为“经济上南京不是重要中心，且自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它已失去了政治上的重要性，至于战略上的重要性，只要一看中国地图就知道了”²⁸。在顺化于斌指出：“中国的战略是消耗战，暂时的得失对于抗战的前途是毫无关系的”，随着日军占领区的扩大，他们将“必须付出大量的军政费来维持”，所以日本必将愈来愈“愈感到困难”，而且“他们虽然占领了这些地方，为了政治的和军事的不安定，也是不能利用的”²⁹。在美国，为了打消国际友人的疑虑，于斌着重从军事的角度论述了抗战的前途，他说：“中国土地幅员之广大，绝不能以为几个城市和据点之得失，即可决定战争胜负”，并把中国的游击战术和消耗战定为一种新的军事理论。认为“这样牺牲小的空间，争取大的时间，以困疲敌人，消耗敌人”，“是中国特殊的地理与社会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新的战略与技术”。这种战略战术是“不能用西方人的观点去解释的，因为中华民族有两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它具有非用西方人的观点所能解释的特点”³⁰。关于中国有无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于斌向欧美人士介绍说：“经过蒋委员长的努力，中国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公路铁路渐次增多，新工业在很快地发展着。精神方面开展了“新生活运动”，“促使人们觉悟和高尚”，“若再持之以恒，那么物质建设只一两个五年计划或十年计划，就可成绩昭彰，说中国人无建设国家的能力，正是不了解新时代的中国人”³¹。

国际政治的关键是趋利避害，于斌也认为国际社会“利害之同情”远远大于“人道之同情”。欧美国家采取何种对华政策，最根本的要看对其国家是否有利，和平呼吁起不了决定作用，但不能因此否定宣传的作用，正如于斌所言，其宣传“虽然未能把国际友人对中日战争片面估计纠正过来，但至少对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认识上有了新的进步”³²。于斌对中国抗战前途的正确解释绝非无关紧要，因为中国战局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对抗战前途的判断直接影响其对华的态度和政策。

其次，争取邦交与外援。抗战期间，于斌多次访问欧美，其中以1938、1943年两次最为重要。因国内难民激增，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灾民赈济委员会”，以许士英为主任委

员。同年，该会派于斌为代表出国访问，向世界呼吁救济，于斌因此衔命出访欧美。去美途中，于斌拜见了教皇，得到“谁帮忙做了救济工作，就可以得到我的降福”的告谕。于斌把教皇这句话广泛刊登在美国各大报纸上³³，使美国的亲日人士无法阻挠其公开演讲。在美期间，于斌访问了200多个城市，四处演讲，采用各种灵活多样的募捐形式，发起了“一碗饭运动”、“一仙运动”、“百辆救护车运动”，“提出“一块美金可使一个中国难民活一个月”的口号，深得美国社会各界的同情，遂得募到巨款，所有款项于斌均不经手，由当地华侨慈善机构汇寄回国，救济灾黎。1943年3月于斌再次访美，在近一年的旅美时间里，于斌四处访问，公开演讲，接见新闻记者，足迹遍及美国48个州，并访问了加拿大，获得极大成功。在华盛顿期间，于斌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并与美国朝野名流交往，尤其是利用其与胡佛总统时期众议院院长麦考米(John W. Mecomark)为至交的便利，要求增拨作战物资，早日修复滇缅公路，增加空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于斌访美期间，正值孔祥熙在美国交涉借款，但进展缓慢。于斌与美国财政部长为故交，由于他从中协助和斡旋，使孔祥熙屡次与美国交涉而无结果的借款问题得以顺利解决，蒋介石特意致电于斌表示谢意。于斌此举在国内反响很大，汤恩伯甚至说于斌是除蒋介石外对抗战贡献最大之人³⁴。在美期间，于斌还就东北问题与美国朝野人士交换了意见，5月11日，他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演说中，特别提到这一问题，使绝大多数美国人一致认为东北确系中国领土，战后日本理所当然应交还中国。此外，于斌还就修改美国《移民法》陈述了意见，他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力陈旧移民法的不合理性，在于斌的努力下，美国歧视华人的条款得以废除³⁵。为传播中国文化，于斌在华盛顿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弘扬祖国优秀文化，出版英文《中国月刊》，刊登中国战况。访美期间，于斌还将公开演讲词编为《东方眼》一书出版，极力从世界政治的高度强调中国抗战的重要性³⁶，要求美国加大援助中国力度。为培养国家人才，于斌还与美国教育机构，尤其是天主教所办大学联络，促成了数千学生在战时和战后留美学习。

六 结 语

于斌在抗战期间奔走呼号，揭露日本暴行于世界，为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国内舆论的好评，但同时也引起日本的嫉恨，被讥讽为“政治主教”，其四叔被日军逮捕，死于狱中，日本还悬赏20万美元缉拿于斌³⁷。虽然于斌在抗战期间的言行，无论是同国民政府方面，还是同罗马教廷方面，也不乏有缺陷的地方³⁸，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上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有价值的遗产，而且也是今天基督教信徒学习的榜样。

注：①参见《益世报》宗教与文化社编《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前言，香港国华印务公司1939年版；于衡《人间天上两茫茫：追忆于斌枢机》，台北《中外杂志》第44卷第5期，1988年11月；甲凯《全面抗战与国民外交》，台北《近代中国》第59期，1987年6月。

②⑤②③《于斌主教对法国报界宣言》，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③④①⑥②⑥《一个国际心理问题》，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⑥⑬④①⑨《抗战期间教友应有的工作》，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⑦转引自顾卫民《国难与基督徒》，《史林》1995年第2期。

⑧①①⑤《教宗八一通电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⑨《为卢沟桥事告南京区所属教胞书》，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⑩参见孟曙初《抗战时期传教士活动述评》，《求索》1990年第2期。

⑪⑰《告南京教胞书》，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 ⑮⑰《总动员中的良心动员》，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 ⑱方豪《益世报二十五年奋斗》，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燕京印书馆1969年版，第2695—2696页。
- ⑲于斌枢机画传编委会《于斌枢机画传》，第205—206页，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⑳雷震远《于斌总主教小史》，载《于斌传记资料》第2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 ㉑黄常伦《主教于斌》，《民国春秋》1999年第3期。
- ㉒⑳《国际同情与抗战》，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 ㉓《对抗战应抱乐观》，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 ㉔⑳《中国新的战争原理》，载《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
- ㉕方豪《四十年前天主教人士参加抗战工作之一般》，台北《东方杂志》(复刊)，1982年第11卷第1期。
- ㉖周世光《于斌枢机主教——最伟大最成功的国民外交家》，载《于斌传记资料》第2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 ㉗潘朝英《追随枢机四十年》，载《于斌传记资料》第3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 ㉘谢鸿轩《于斌传》，台北《国史馆馆刊》(复刊)，1992年第12期。
- ㉙张兴唐《于枢机野声先生传》，台北《华学周刊》1979年第87期(总)。
- ㉚参见《对抗战应抱乐观》；《国际同情与抗战》；《一个国际心理问题》；《于斌主教访问记》，见《言论集》；罗竹凤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恩涵教授、台湾辅仁大学学术交流室张淑芳主任的资料帮助，特此致谢。)

(作者徐畅、牛淑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邮编250100)

(责任编辑 王道瑞)

(上接第98页)

- 注：①⑥光绪《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荒政记。
- ②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T. Fisher Unwin LTD, 1916, p129—134.
- ③《申报》，1878年4月1日。
- ④光绪《太谷县志》，卷三，户口。
- ⑤转引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 ⑦《张文襄公全集》，卷五，第18~21页。
- ⑧⑪⑫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23、273—274、514—515页。
- ⑨民国《翼城县志》，仓储。
- ⑩刘泽民主编《山西通史》，卷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 ⑬Paul Richard Bohar 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Timothy Richard as relief administrator and advocator of national refor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06.
- ⑭⑮⑱⑲⑳Famine in China and the missionary, p107, p107—110, p112, p111, p109.
- ⑰Broomhall 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Book Six: Assault on the Nine, Hodder & Stoughton, 1988, p183.
- ⑱《万国公报》第12册，总第7334—7336页。
- ⑳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Book Six: Assault on the Nine, p177—178.
- ㉑《万国公报》，第7册，第4132页。
- ㉒⑳⑳《万国公报》，第17册，第10795、10795、10795页。
- ㉓⑳⑳《万国公报》，第14册，第8615、8615页。
- ㉔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经世文三编》卷三十四。
- 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3页。

(作者赵英霞 山西大学历史系讲师 邮编030006)

(责任编辑 谢小华)

抗战时期于斌主教述论

作者: [徐畅](#), [牛淑萍](#), [Xu Chang](#), [Niu Shu-ping](#)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刊名: [历史档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ISTORICAL ARCHIVES](#)
年, 卷(期): 2005, "" (3)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 (26条)

1. [益世报·宗教与文化社编·于斌主教抗战言论集·前言](#) 1939
2. [于衡 人间天上两茫茫:追忆于斌枢机](#) 1988
3. [甲凯 全面抗战与国民外交](#) 1987 (59)
4. [于斌主教对法国报界宣言](#)
5. [一个国际心理问题](#)
6. [抗战期间教友应有的工作](#)
7. [顾卫民 国难与基督徒](#) 1995 (02)
8. [教宗八一通电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
9. [为卢沟桥事告南京区所属教胞书](#)
10. [孟曙初 抗战时期传教士活动述评](#) 1990 (02)
11. [告南京教胞书](#)
12. [总动员中的良心动员](#)
13. [方豪 益世报二十五年奋斗](#) 1969
14. [于斌枢机画传委会 于斌枢机画传](#) 1998
15. [雷震远 于斌总主教小史](#) 1985
16. [黄常伦 主教于斌](#) 1999 (03)
17. [国际同情与抗战](#)
18. [对抗战应抱乐观](#)
19. [中国新的战争原理](#)
20. [方豪 四十年前天主教人士参加抗战工作之一般](#) 1982 (01)
21. [周世光 于斌枢机主教—最伟大最成功的国民外交家](#) 1985
22. [潘朝英 追随枢机四十年](#) 1985
23. [谢鸿轩 于斌传](#) 1992 (12)
24. [张兴唐 于枢机野声先生传](#) 1979 (87)
25. [对抗战应抱乐观·;·国际同情与抗战·;·一个国际心理问题·;·于斌主教访问记·,·言论集](#)

26. 罗竹凤 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 1985

引证文献(1条)

1. 高俊 简述江苏基督教界的抗日活动[期刊论文]-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sda20050301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bd65da02-095d-4150-ad8c-9e4d00831a8d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